

西方福利经济学述评

陈汉生 吴品峰 李健 著



商务印书馆

西方福利经济学述评

厉以宁 吴易风 李懿 著

商 务 印 书 馆

1984年·北京

XIFANG FULI JINGJIXUE SHUPING

西方福利经济学述评

厉以宁 吴易风 李懿 著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统一书号: 4017·298

1984年6月第1版

开本 850×1168 1/32

1984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字数 236 千

印数 7,000 册

印张 10

定价: 1.25 元

前 言

在 1960 年时,为了适应高等学校教学参考的需要,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和经济研究所有联合编写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说的计划。编写“福利经济学”是这个计划的一部分。当时负责编写的,有北京大学罗志如同志,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巫宝三、汪友泉、李懿同志。编写工作在 1965 年基本完成,接着将初稿分送有关方面,并在北京大学经济系举行了一次征求意见的会议。以后将初稿加以修改,本拟送出付印,但因“文化大革命”开始,未果。这样,这部文稿就搁置了十多年。十年内乱结束以后,尤其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通过拨乱反正,各条战线都出现了欣欣向荣的局面,经济学界亦不例外。在各种学会纷纷成立之际,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也在 1979 年成立。由此,我想到搁置了十多年的“福利经济学”那部稿子,想到它对于了解西方经济学说还有些用处。但是事隔十多年,西方“福利经济学”已有很多新的发展,旧稿已不适合于出版,而必须大加修改和补充。可是旧稿编写人员罗志如同志和我,已有其他工作在手,难以重理旧业,汪友泉同志则在国外,只有李懿同志仍继续此项研究。所幸北京大学厉以宁同志、中国人民大学吴易风同志对“福利经济学”已进行了多年研究,并对它的新发展进行了探索。这样,修改和补充旧的稿子就有了很好的条件。因此,我们征求了厉以宁、吴易风、李懿三位同志的同意,并得到了北大、人大和经济所负责同志的支持,于 1981 年夏间正式商定由厉以宁、吴易风、李懿同志负责修改和补充“福利经济学”旧稿,完成以后,交出版社出版。经过三位同志的共同努力,而由厉以宁同

志总其成，费力最多，全稿于今年9月间完成。此稿包括六十年代以后此学的重要发展，由此可以窥见西方此学的梗概，甚可庆幸。最近与三位编写同志共同商定，将此稿送商务印书馆出版。余喜这一专题终由厉以宁、吴易风、李懿三位同志共同编写完成，以飨读者，因略述此书编写经过如上。

巫宝三

1982年12月

目 录

第一章 绪论	1
第一节 福利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	1
一、边沁的功利主义原则	2
二、边沁以后功利主义学说的发展	4
三、“消费者剩余”和“最优状态”概念的提出	7
四、福利经济学的产生	11
五、福利经济学的发展	13
第二节 福利经济学的特点	16
一、提出资产阶级的道德标准,标榜规范研究	16
二、在边际效用价值论基础上提出福利概念	19
三、利用所提出的道德标准和福利理论作为制定经济政策的指导原则	23
第二章 庇古的福利经济学	27
第一节 效用基数和经济福利	29
一、庇古对福利的解释	29
二、庇古采用边际效用分析法来计算经济福利	30
三、庇古关于计算经济福利时货币边际效用不变的假定	33
四、庇古论经济福利与国民收入之间的关系	36
五、庇古关于经济福利的学说的虚伪性	38
第二节 收入的转移	39
一、国民收入分配问题的提出	39
二、庇古的“收入均等化”学说的基本论点	41
三、庇古的“收入均等化”学说的实质	43
四、庇古从“收入转移论”引申出来的四个论点	44
五、庇古论转移收入的具体措施	46

第三节 社会资源的最优配置	49
一、社会资源最优配置问题的提出	49
二、庇古在资源配置问题上采用的分析方法	50
三、庇古论边际私人纯产值与边际社会纯产值背离 条件下国家干预的必要性	52
四、庇古对于边际私人纯产值与边际社会纯产值 背离原因的分析	54
五、庇古的社会资源配置学说的评价	58
第四节 国民收入变动的计算	61
一、庇古关于国民收入增加的说明	61
二、庇古关于国民收入变动的计算方法	62
三、庇古关于国民收入变动的含义所引起的争议	65
第三章 新福利经济学	68
第一节 效用序数	70
一、效用序数的含义	70
二、边际替代率	71
三、无差异曲线	73
四、消费可能线	74
五、收入和价格变动条件下消费者均衡点的移动	76
六、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分析	79
七、效用序数和效用基数的异同	81
八、从效用序数论得出的福利概念	82
第二节 最优条件	84
一、最优条件的含义	84
二、交换的最优条件	86
三、生产的最优条件	90
四、生产的最优条件和交换的最优条件的结合	94
五、两国之间生产和交换的最优状态	96
六、最优条件论的评价	99
第三节 补偿原则	100
一、补偿问题的提出	100
二、卡尔多的福利标准	102

三、希克斯的福利标准	105
四、西托夫斯基的福利标准	107
五、李特尔的福利标准	109
第四节 社会福利函数	112
一、社会福利函数论的特点	112
二、社会福利函数的表述形式	113
三、社会福利最大化的条件	114
四、“理想的收入分配”的实质	117
五、社会福利函数论与经济政策的制定	119
第四章 福利经济学与“社会主义”经济学	121
第一节 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经济学的产生与发展	122
一、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经济学的产生	123
二、资产阶级经济学界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学的两个 派别	126
三、熊彼特对“社会主义”经济学渊源的分析	127
第二节 福利经济学中对社会主义本质的曲解	129
一、庇古对“社会主义”的解释	130
二、庇古的“社会主义”概念的谬误	132
三、勒纳对“社会主义”的解释	133
四、勒纳命题的谬误	136
五、熊彼特对“社会主义”的解释	136
六、熊彼特对社会主义性质的曲解	139
第三节 福利经济学中关于“计划化”的论述	141
一、福利经济学中社会主义“计划化”的出发点	141
二、社会主义“计划化”中的计算问题	142
三、福利经济学中“社会主义计划化目标”的剖析	144
第四节 福利经济学家论社会主义经济中“最优”条件的 实现	146
一、所谓“竞争解决法”	146
二、“竞争解决”模式的庸俗性	148
三、所谓“中央集中解决法”	150
四、中央集中解决模式的谬误	152

五、所谓“国家偏好函数”和“双重评价体系”	152
六、多布关于实现“最优条件”的论点	156
第五章 福利经济学与经济政策	162
第一节 “福利国家”政策	162
一、“福利国家论”与福利经济学的关系	162
二、庇古的收入均等化学说对福利国家政策的 影响	163
三、资本主义国家累进税政策的实质	166
四、资本主义国家“社会福利”设施的实质	168
第二节 价格和产量政策	170
一、新旧福利经济学家重视经济效率的原因	170
二、福利经济学中关于制定生产政策的一般原则	171
三、霍推林提出的产量和价格方案	175
四、霍推林方案的实质	177
五、霍推林方案实行过程中的政府干预与自由经营的 矛盾	178
六、霍推林方案实行过程中的课税问题	181
七、多种收费方案和区别定价方案	186
第三节 对外贸易政策	189
一、当代西方国际贸易理论的特点: 国际贸易理论 与福利理论的结合	189
二、自由贸易政策与所谓“世界福利”	191
三、保护贸易政策与所谓“民族福利”	196
四、“最优关税率”	199
第六章 当前资产阶级福利经济理论的动向	206
第一节 外部经济理论	206
一、“外部影响”的含义	206
二、七十年代以前福利经济学中关于外部经济问题的 研究	208
三、外部经济理论的基本特征	219
四、外部经济理论中关于财产权的学说	220

五、外部经济的计算	222
六、福利经济学中有关外部经济理论的若干新论点	226
第二节 次优理论	229
一、次优问题的提出	229
二、次优理论的产生和发展	231
三、次优理论的中心思想	234
四、次优理论怎样为资产阶级政府的政策服务? ——以 关税同盟为例	238
第三节 相对福利学说	242
一、对庇古福利命题的怀疑	242
二、相对收入假定和相对福利学说	244
三、关于福利的比较问题	248
四、相对福利学说的政策含义	250
五、相对福利学说关于未来社会的设想	252
六、相对福利学说的庸俗性和辩护性	255
第四节 “平等”和“效率”交替学说	256
一、“平等”和“效率”的交替	256
二、平等和效率的先后次序	258
三、平等和效率协调的模式——混合经济制度	261
四、关于改善平等和效率之间关系的具体措施	265
五、资本主义制度下平等和效率交替问题的实质	267
第五节 关于国民福利尺度的讨论	270
一、国民生产总值作为衡量福利的尺度	270
二、国民生产总值指标的局限性和缺陷	271
三、“经济福利尺度”和“纯经济福利”	273
四、“社会财富”作为衡量福利的指标	275
五、综合福利指标	277
六、有关福利指标讨论的意义	279
第六节 宏观福利理论的探讨	279
一、宏观福利经济问题的提出: 勒纳的论述	279
二、对“最优增长”概念的异议	284
三、通货膨胀与失业交替条件下的宏观福利问题	285

四、关于通货膨胀对福利变动的影响的论述	291
五、关于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论述	296
六、政治周期理论	298
人名索引	302

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福利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

什么是福利经济学？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曾经对福利经济学下过各种不同的定义，但比较流行的一种说法是：福利经济学是从福利的观点对经济体系的运行进行评价的经济学。这里所说的“从福利的观点”，包含了价值判断的标准在内，这就是：使福利增进就是“好”，使福利减少就是“坏”。这里所说的“从福利的观点对经济体系的运行进行评价”，是指判断一种经济体系的运行究竟是增进福利还是减少福利：能够增进福利的经济体系运行被认为是“好的”，导致福利减少的经济体系运行被认为是“不好的”。至于什么是“福利”？什么是判断福利增加或减少的标准，福利经济学家们提出了各种不同观点，这些将在本书以下各章中再予以评述。

福利经济学作为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在本世纪初形成于英国，后来在美国、瑞典、法国等国得到传播。福利经济学的出现，是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英国社会经济矛盾和阶级矛盾激化的结果。

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起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已经从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阶段过渡到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是不平衡的。在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英国在主要工业品的产量方面先后被跳跃式发展的美国和德国所超过。号称“世界工厂”和“日不落帝国”的英国，逐渐丧失了世界工业的垄断地位和世界贸易的垄断地位。1914—1918

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是资本主义政治和经济危机的结果,是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和帝国主义国家间矛盾激化的结果。但是,战争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这些矛盾。相反,它加剧了资本主义的各种矛盾,促进了人民群众的觉醒。列宁指出:“英德两个金融强盗集团争夺脏物的战争留下的几千万尸体和残废者,以及后来的这两个‘和约’,空前迅速地唤醒了千百万受资产阶级压抑、蹂躏、欺骗、愚弄的民众。于是,在战争造成的全世界的经济破坏的基础上,世界革命危机日益成熟,这个危机不管会经过多么长久而艰苦的曲折,其结局只能是无产阶级革命爆发并且获得胜利。”^①1917年,震撼世界的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就是在这一历史条件下爆发并且取得胜利的。

面对着日益激化的社会经济矛盾和阶级矛盾,一些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提出要通过社会经济福利的研究来改善社会状况,缓和国内的阶级矛盾。在这种背景下,福利经济学为适应资产阶级的需要而孕育和产生了。

一、边沁的功利主义原则

资产阶级福利经济学以边沁的功利主义哲学作为思想基础。

边沁(1748—1832)是自由资本主义时代英国的资产阶级社会学家和哲学家。他宣扬资产阶级的道德哲学和政治思想,把资产阶级的阶级利益说成是“普遍的利益”。他认为,人们的理性活动是寻求快乐和避免痛苦,如果让每个人都能自由地追求个人利益,那就会实现公共利益,即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因此,他把道德归结为快乐和痛苦的计算,他把这称为“效用原则”。效用原则或译为功利原则或功用原则。这种原则不但规定个人应当做什么和将要做什么,并且还规定社会应当做什么和将要做什么,因为社会

^① 《列宁选集》,第2卷,第734页。

被认为是个人的总和。这种原则被用来指导政府的立法，它认为政府应当实行自由放任政策，使每个人不受阻碍地去追求自己的利益。这实际上是让资产者不受阻碍地去追逐尽可能多的利润。

实际上，把所谓最大幸福作为人们行为的道德标准，在西方很早就已出现。在近代，以最大幸福作为道德标准的观点，最早见于里查德·孔伯兰(1631—1718)的《论自然规律》(1670)一书。边沁自己承认，约瑟夫·普里斯特利(1733—1804)在《政治原理要义》(1768)一书中提出的“一国大多数成员的利益应作为国家一切政策的标准”的主张，对他有直接的影响。尽管如此，在后来的西方哲学界和经济学界，边沁仍被看成是功利主义这一道德哲学原则的创立者，因为他不仅提出了功利主义概念，而且使之具有经济理论 and 政策的含义。

边沁的功利主义原则的经济理论和政策的含义在于：既然功利应当作为道德最高准则的原理，追求幸福是基于人类本性的根本动机，而社会作为个人的总和，社会的幸福作为社会成员的幸福总和，那么，“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原则既是道德标准，又是立法和制定政策的标准。假定在个人与社会之间，至少在最大多数人之外的少数人与最大多数人之间，在幸福方面存在着矛盾的话，那么就需要对这种矛盾进行调和。但总的说来，个人只能在整体的利益中获得自己的幸福；而从长期来说，少数人将由于社会幸福的增进而分享这种利益。由于边沁认为只有个人才能对于自己切身的苦乐有深切的了解，个人不但最清楚地知道什么构成自己的幸福，而且是唯一知道什么构成自己的幸福的人，因此，个人追求私利是正当的，这种追求不应当受到任何干涉。这样，边沁功利主义原则的最重要的经济理论和政策含义就是要求自由放任，要求国家不干预私人经济活动。

二、边沁以后功利主义学说的发展

边沁的功利主义学说到了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詹姆斯·穆勒(1773—1836)的手里,便同政治经济学正式结合在一起。詹姆斯·穆勒从边沁的功利主义出发,认为经济学的研究应当关心人的幸福所在,而资本主义的现实生活却可以使个人的利益与公共利益相结合。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不仅个人可以得到幸福,公众也可以得到幸福。因此,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指出的,经过詹姆斯·穆勒之手,“经济学的内容逐渐使功利论变成了替现存事物的单纯的辩护,变成了这样的说教:在目前条件下,人们彼此之间的现有的关系是最有益的、最有公益的关系”。^①

后来,詹姆斯·穆勒的儿子约翰·穆勒(1806—1873)坚持功利主义学说,并在这方面作了新的发展。他认为,凡是能促进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的行为,就是正义的行为。但是,约翰·穆勒所处的时代已经是不同于边沁和詹姆斯·穆勒的时代了。一方面,约翰·穆勒仍然是边沁功利主义的追随者,是自由放任政策的拥护者;但另一方面,在资本主义矛盾日益暴露的情况下,在宪章运动、工会运动和社会主义思想的冲击下,约翰·穆勒对资本主义社会中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冲突的日益尖锐化感到不安,他主张采取某些国家干预政策,在维护资产阶级利益的前提下把已经不容忽视的无产阶级要求同资产阶级利益调和起来。约翰·穆勒指出,那种认为政府最好什么事情也不管的论点,有正确之处,也有错误之处。正确之处在于:政府不应当干预个人的自由;错误之处在于,政府放弃了它应有的直接和间接促进人民福利改善的职责。因此,约翰·穆勒以一个社会改良者的身份出现,他主张在保存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的同时,限制遗产的继承,发展合作社,增加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484页。

对贫民的救济等等。

约翰·穆勒曾经写道：“人类有理由，个别地或集体地，干预任何其他成员的行动自由的唯一目的是自卫。有权对一个文明社会中的任何一个成员，不问其本人是否愿意，正当地施行权力的唯一目标是为了防止对别人的损害。为了他个人的好处，无论是物质的或道义上的，都不足以构成充分的理由。”^①但他在另一场合又这样表述了自己的观点：“不应当把人类划分成为两个遗传下来的阶级——雇用者和受雇者——看成是可以长久维持的制度；”“如果可以在具有一切可能性的共产主义和具有一切苦难与不公正的现代社会状态之间作一选择的话；如果私有财产制度必然附有这样一种后果，即劳动的产品应该照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方式进行分配（那几乎是和劳动成反比例的）的话……，如果可以在这与共产主义两者之间进行选择的话，那么共产主义的所有大大小小的困难都是微不足道的。”^②约翰·穆勒的这两种看法恰恰是矛盾的。前一种看法，是对边沁的功利主义哲学的阐发，是对自由放任原则的颂扬；后一种看法则是对边沁的功利主义哲学的怀疑和否定，是对私有财产制度的谴责和对社会改良的推崇。约翰·穆勒无疑是一个折中主义者，这种折中主义的思想对后来的福利经济学家是有影响的。当然，这种折中实际上是行不通的，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约翰·穆勒和其追随者是“毫无生气的混合主义”，“企图调和不能调和的东西”。^③

约翰·穆勒的折中主义在资本主义矛盾发展的现实面前逐步破产。从1870年起，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为了加强对资本主义制度的辩护，改变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以完全脱离了历史条件的

① 约翰·穆勒：《论自由》，1924年版，第15页。

② 约翰·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1923年版，第761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17、18页。

“经济人”的欲望和满足为考察中心，提出了边际效用价值学说来代替劳动价值学说。边际效用价值学说是一种主观主义的价值论，它从抽象的个人欲望出发，用买卖双方的主观估价来说明市场价格，进而否定资本主义剥削关系，掩盖剥削阶级攫取剩余价值的生产活动和奢侈性的消费活动。这种主观的价值学说使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更便于利用边沁的功利主义来解释人类的经济活动，因为价值本身就是一种评价，所以“最大幸福”也无非是一种主观的感受。不仅如此，边际效用论者在把边沁的“效用原则”用于价值学说时，还应用微积分学求出效用的最大数值，以便使边沁的道德概念“最大幸福原则”具有数量的内容。边际效用价值学说创立者之一威廉·斯坦利·杰文斯(1835—1882)在所著《政治经济学理论》一书第一版序言(1871年)中曾说过：“在这本书中，我试图把政治经济学当作快乐和痛苦的一种微积分学”。^①在同书中，他还说：“经济学的目的是使幸福达到最大程度……我毫不踌躇地接受功利主义的道德学说，它确认对于人们幸福的效果是判断正确和错误的准则”。^②这种把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变为完全主观内容的说教，以后就和边沁的功利主义政治、道德、哲学一起变成了福利经济学的理论依据。

在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威廉·斯坦利·杰文斯在“把政治经济学当作快乐和痛苦的一种微积分学”以及认为“经济学的目的是使幸福达到最大程度”的同时，尽管他口头上声称自己“毫不踌躇地接受功利主义的道德学说”，实际上他仍然遇到了与约翰·穆勒相似的困难。约翰·穆勒的折中主义对于杰文斯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杰文斯感到，如果完全按照边沁的功利主义原则去做，将会碰到不少矛盾；但如果摒弃这一原则，又会带来更多的问題，所以杰

① 杰文斯：《政治经济学理论》，1957年第5版，第VI页。

② 同上书，第23页。